

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理论背景分析*

马国栋

(宁夏医科大学 管理学院,宁夏 银川 750004)

摘要: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思想激流的时代。整个欧洲社会就西方现代化的现实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和总结,展开了一场开放性的反思和批判。尽管由此而掀起的讨论浪潮并不是附着在生态环境与经济主题之上,然而却对环境与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种理论思考的基础和条件。本文详细阐述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基础,指出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认识应还原到其产生的“思想情境”中去,要在深刻理解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之上深化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认识。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环境危机;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14)03-0066-07

生态现代化概念是德国环境社会学家约瑟夫·哈勃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①,用以指称经济重构的绿色转折,其基本初衷在于分析和实现现代工业社会对环境危机的有效应对,主张从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出发,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最终达至双赢的局面。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也不是空想的结果,而是社会发展进入生态时代的客观必然。

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思想激流的时代。整个欧洲社会就西方现代化的现实进行了理论的思考和总结,展开了一场开放性的反思和批判。尽管由此而掀起的讨论浪潮并不是附着在生态环境与经济主题之上,然而却对环境改善与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某种理论思考的基础和条件。正是出于对这些理论智慧的汇聚、综合、接纳、反驳,才形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模式。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社会理论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情境”。

一、生态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风格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巨大经济危机,在这场危机中,生产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空前激烈。经济学家试图寻找解救资本主义的出路,一些学者则坚定地站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边,宣称要坚守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以“看不见的手”带动经济投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循环流动,然而与自由主义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决然反对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认为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对经济的运行是必要的,于是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主张。而以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为代表的一部分学者则毅然强调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认为借助国家对货币资本流通和信贷的调节,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从而开辟了凯恩斯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路径。

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交锋的过程中,

* 【收稿日期】2014-06-06

【作者简介】马国栋(1982-),男,宁夏平罗人,宁夏医科大学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

【基金项目】宁夏自然科学基金项目(NZ12197)

①See: Mol A P J, Spaargaren G.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in debate: a review[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0, 9(1): 17-49; Hajer M 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the police proces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成就了凯恩斯主义的辉煌,也使新自由主义一度陷入沉寂。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及后来的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了政府在人员安置、财物分配等各个方面所表现出的强大力量和优势,认为凯恩斯主义能够让资本主义重新活跃起来。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当又一次经济危机来袭时,人们则认为这是凯恩斯扩张性政策(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扩张性收入政策)的结果,于是要求改变国家干预方式的呼声高涨,公众则希望有一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优化产业结构的模式出现以带动经济的增长,于是,借此东风,新自由主义重新焕发了生机,从此大行其道,在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哈耶克、弗里德曼、欧根、穆斯等学者那里似乎是不一致的,但却具有一些共性,学者们充盈着新自由主义的内涵,对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深信不疑。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合理的,能够对资源起到优化配置的作用,市场不仅仅是交换的场所,更是传递信息的平台,通过市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得以互通有无,而生产要素也能够得到合理配置。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只有将自由放任的市场原则嵌入政策结构中,才是一种带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

新自由主义者反对政府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在肯定市场的绝对地位之后,他们指出,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会妨碍市场机能正常有效发挥,它不仅限制了市场信息渠道的流通,还对个体经济活动的开展造成影响。国家的过度干预妨碍了经济的繁荣发展。但是必须强调的是,新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完全彻底否认政府干预的作用,他们承认通过政府有限的或者轻微的干预手段来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是必要的。

新自由主义者认同私有制,在他们看来,私有制是市场得以发挥效力的先决条件。只有给予私人以充分的经济自由才能确保市场调节机制的有效运行,私人企业的利益追求更是经济发展动力的最好表征。只有在私有制的框架内才能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而相比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其

他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逆向的。

当然,除了上述几条最根本的主张之外,新自由主义的细节论述还相当丰富,它们共同构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尽管摩尔、舒恩菲等研究生态现代化的学者们并没有费太多笔墨来论述新自由主义对生态现代化产生的影响,但是从他们的论述中还是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生态现代化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痕迹。

首先,与新自由主义相一致,生态现代化理论所要表达的仍然是资本主义的立场,其最初的理想是要在现有的社会制度框架内实现对经济发展的“绿化”,而不是要冲破资本主义制度,寻求某种体制上的创新甚或社会发展制度方向上的改变。在这一点上,伴随新自由主义复兴而产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恪守了新自由主义所要求坚持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即便随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而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的特色,不再强调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范围,转而将目光投向发展中的工业经济体,但是其基本的立场和发生条件是不会改变的,即便是到了20世纪末它也并没有变得对资本主义不利,而是积极地适应它^①。

其次,生态现代化理论家并没有对市场经济抱有任何根本性的批判和质疑,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吻合,生态现代化理论更加注重从市场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他们对环境变革中的市场角色和动力持欢迎态度^[1],认为市场机制本身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只不过对于人与自然和谐的需求而言,使经济链条绿色化是必要的,而这种想法也是可行的。在某种意义上,生态现代化是以经济和市场为主线的,它强调将环境退化用经济货币来计算^[2],这与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观紧密相关。

再次,生态现代化理论也重视国家干预、政策整合和调整在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并没有强

^①See: Mol A P J. The refinement of production: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theory and the chemical industry [M].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Van Arkel, 1995; Weale A. The new politics of pollution [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 75; Hajer M 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the police proces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调政府干预、政策整合是经济生态化唯一有效的手段或工具。这也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干预依然是使经济繁荣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以及引起环境改革多样化战略中的一个要素,而不是主导经济发展的政策把手。生态现代化概念的提出者哈勃就持这样的观点,这与新自由主义对待国家干预的主张是相一致的。

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准确地说是20世纪70年代走上复兴的新自由主义对生态现代化的产生确实是有影响的,而且是根本性的影响。不管研究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本人是否是新自由主义者,生态现代化理论本身所反映出的新自由主义风格则相当明显^①。

二、生态现代化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

一种理论甚或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往往与其对立面是分不开的。新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对走向垄断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化、政府、科学与理性等领域的批判反而促成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他们修正性的坚持。正是在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一批先进的行动主义者才积极地参与到环境反思的社会运动中去,有意识地去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与环境危机的内在联系。可以这样说,新马克思主义启动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引擎,同时也激发了一些人找寻得以维护资本主义、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意志和愿望,这也是新马克思主义所彰显的一种魅力吧!

新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一种修正,不论是葛兰西还是卢卡奇以及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都非常强调观念和意识的重要价值和作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表现进行了言之确凿的批判。而在环境方面,康芒纳、史莱伯格、浜克等新马克思主义者更是指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广泛存在正是现代化的恶果,只有从根本上认识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使现代化不至于走入不复的深渊。

新马克思主义者视资本主义“国家”为许多突出现问题的罪魁祸首。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在资本主义内部,资产阶级通过自己的霸权地位来

获取对整个国家的支配。凭借资产阶级的企业,国家得以控制市民社会,使得资产阶级的各项意愿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当中。知识诉求、评价标准、价值取向都被资产阶级的政治精英所控制和把持,所以任何在社会发展当中出现的问题都与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府脱不了干系,政府应对问题的出现负有相当的责任。

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科学不再是中立、客观的,因为它附着于资产阶级政府的意志支配下,具有强烈的资本主义“政治”内涵。在资本主义内部,那些以往通过科学而树立起客观、中立形象的科学家以及凭借专业化知识而在某一领域具有精英业绩的专家也难免成为资产阶级政治运作的产物,他们不能够很好地代表无产阶级大众的利益诉求。于是,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支配的所谓的科学家和专家的“中立”只能算是一个隐匿了政治性而裸露在外的幌子。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但促使人与自然的分离得以实现,将人对自然控制的权力和欲望推向极致,而且使得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异化,被控制的自然逐渐成为资本主义权力支配和控制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导致的环境异化,则不能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而应理解为是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表现。通过控制自然而控制人,进而使社会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全体民众的利益共同努力^[3]。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政策也具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想彻底解决问题,推行了诸如福利国家政策等一系列措施,然而这些举措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府操纵的,它不过是为了消解对立、化解不满而使社会主义者、工业无产阶级以及进步的知识分子安分地待在资本主义所设定的框架结构中的一项权宜之计而已。

新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工业化、现代化也持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化和政府一同炮制了环境恶化,现代化的工业生产将环境单纯地视为客体的对象,资本家则以生产

^①实际上,环境社会学家摩尔表示他本人并不是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

索取的方式、蔑视的态度对待自然。这种在资本主义固有的文化观念所指引下的工业化进程天然地具有环境破坏性,它与资本主义的工具理性之间具有莫大的联系。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具理性所导致的文化是一种手段文化,而不是一种目的文化,也就是说,更注重的是实现结果的方式,而不是该结果本身^[4]。它的表现就是资本主义的目标动机不在于真理的发现、和平的实现、饥饿的消除,而在于原本应该作为一种“实用工具”的商品消费。一些激进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更是向资本主义的工业文化发出宣言,呼吁社会走“去工业化”的道路。

生态现代化就是在这种思潮的兴起和衰退的反向影响下产生的。特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西方世界整个思想文化氛围发生的巨大改变,新马克思主义逐渐式微,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萌生了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思想和理论建议,而生态现代化则是其中一个独具特色的部分。

生态现代化似乎并不愿意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问题做出充分的回应,因为在生态现代化的理论论述中很难找到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探讨。主流的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既不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环境改革的先决条件,也不把它看作关键性的阻碍^[1]。这就意味着,生态现代化理论无意正视新马克思主义所宣称的资本主义蕴含着自身毁灭的根源,并且或多或少表现出对于这种观点的排斥。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价值本身是试图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成功找到社会转型的途径,同时可以内化对环境的关心,在不改变现代化进程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获得理想的发展。生态现代化的这种表现显然是在转移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在生态现代化理论那里,国家、政府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态转型的凭借,通过政府各种环境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环境危机是可以克服的。不会像新马克思主义图示所描绘的那样——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是环境问题的根源,政府常常是结构性地不能对环境问题的消解起到任何作用。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环境问题的产生、危机的出现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的,而问题的根本则在于,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府没有办法改变这种追求资本积累和经济利益的经济结构,所以环境危机的屡屡出现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在生态现代化理论看来,政府有能力优化已有的经济结构,科学技术的手段、环境政策、工业政策的调整等方式、方法的应用也足以控制和消弭资本积累过程中出现的消极的环境影响或副作用。

对于科学技术,生态现代化理论家们则抱有一种积极的态度。他们坚定地认为科学技术的绿色化升级必定能够带来一种意想不到的令人满意的效果。节水、节能、节材、资源回收及再利用等一系列绿色工业技术的研发创新和应用不但能够积极地预防和应对环境问题的发生,而且还可以给工业企业带来更大的利润、提升企业部门的竞争力,使现代工业化得以稳步推进。这与新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相比,生态现代化又明显持乐观主义的、单一倾向的态度,技术所带来的风险从意识上被弱化了,不管现实以及未来是否真的存在技术风险的爆发。

总的说来,新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仅为生态现代化的理论家们提供了一种对立面的参照,而且还与包括环境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环境社会科学都有很强的相关性——新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图示是他们无法忽视的^[5]。直到今天,学术界对于环境问题、环境危机的根源、环境意识、环境运动、资本主义政府失灵等研究主题的讨论都还离不开新马克思主义这种核心的理论解释。

三、生态现代化与后现代主义诟病

后现代主义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鼎盛,以德里达、利奥塔、格里芬、福柯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现代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们指责现代化理性变成了纯粹的工具理性,现代化所信奉的人道主义、大肆宣扬的人权理念不过是工具理性旗下的一员,人则处于被奴役的位置,进而,他们表达出一系列“反抗”的愿望——反理性、反主体性、反形而上学、反“同一性”、反整体性等,进而形成了一种既孕育于现

代主义内部但却反叛和矫枉现代主义的思潮——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和其反“同一性”主张一样,后现代主义是多元的。尽管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和解构,但是不同的后现代主义者所秉持的批判和解构取向是不相一致的,他们对后现代抱有不同的态度和主张。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福柯的话语权力、利奥塔的知识合法化危机……从不同的角度对后现代主义的图景进行了描绘。然而即便如此,他们都有着后现代主义的鲜明特点,即他们都习惯于对他人已经构建的东西进行拆解,对综合和整体的东西保持怀疑,对置于圣坛上的权威施以挑战,对确定和实然之物进行毁灭。

后现代主义者的这种思考路径和风格,让西方世界为之产生不小的震颤。这种震颤一方面来源于后现代主义本身对结构的拆解和对现代化的反叛;另一方面则来源于拆解和反叛对于传统研究所形成的威胁和启示。它使许多领域的学者不得不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做出回应,以便让自己的立场更加坚定和具有合法性。生态现代化理论形成的早期和后来的发展就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者的质疑和批判,他们认为生态现代化不过是一个被建构的神话,宏大的叙述让人们越发不能看清现在以及未来发展的真实面貌。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对生态现代化理论的诟病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立场和主张。

首先,后现代主义孕育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之中,它包含了对现代主义传统的批判和抗议。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实践的产物,现代主义放纵了人的主体性,过份地宣扬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不恰当地造成了人与人、人与环境关系异化的结果。现代化所极力推崇的“理性”并不会、也没有将人类从压迫、束缚带向自由、解放,相反,它越发将社会禁锢在一个封闭的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要想超脱实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生态现代化理论被视为现代主义的遗产,因为从根本上来讲,生态现代

化理论并没抛开现代化而进入一个新的运行轨道,而是始终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昭示了两者无法区隔的亲密关系。沿着现代化的线索,生态现代化不过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种理论表象,即便贴上了“生态”的标签,并试图用生态理性的话语重新塑造现代化的形象,但却无法掩盖现代化“工具性”的特质。后现代主义对生态现代化的批判是激烈的,其程度不亚于持“反生产”、“去工业化”、“去现代化”观点的学者们对现代化、现代性的传统批判。

而在变革性问题上,生态现代化理论也不过是修补性的,更确切地说是技术修复性的,这与后现代主义主张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变迁存在巨大的鸿沟,二者的观点从根本上是対立的。后现代主义指责生态现代化理论除了对现代化做了些许缝缝补补,却未能使整个社会实现根本性改变。

其次,后现代主义极力反对中心的存在,认为差异性才是应该努力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同一性和整体性则根本是一种华而不实的空想,无论通过任何努力都是无法真正获得的。多元性、差异性视角才能够带来对事物的更加深入的认识。利奥塔就发出了这样的号召,“让我们向统一的整体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言说之物的见证者,让我们不妥协地开发各种歧见,让我们为秉持不同之名的荣誉而努力”^[6]。

由此看来,后现代主义对于概念的普同性非常质疑:是否真的存在一个一元的概念可以清楚明白地指示和阐明事物本身?答案是否定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社会系统、理性、标准等都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概念,而是一个包含了时间跨度、地域跨度以及文化跨度的差异性概念。以此为理论依据,生态现代化理论就显示出明显的弊端。形成初期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所宣扬的生态理性、环境标准等都成为一种简约化的宏大知识,缺乏细致化的地方性和时间性考量。而作为世界各国所共同倡导的“可持续”理念也便成为一个离散的概念,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以及同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间所理解和追求的可持续性内涵有着明显的差异性,而不是像诸如生态现代化这样的理论所表征的那样,都具有统一的欧洲

向心力。

再次,后现代主义最引以为傲的方法论技巧在于解构。以德里达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者不相信事物存在一个一成不变的固定本质和特征,他们消解了结构以及位于结构化框架之中的中心、权威,所谓中心、权威是建构的结果。在传统学者看来是问题的问题,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则不是什么问题,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还宣称问题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来,人们为了解决问题而付出努力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他们解构了问题本身。利奥塔所反对的宏大叙事也位于需要消解的队列之中,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宏大叙事或整体叙事所代表的现代性诉求无论如何也是不切实际的,不论付出怎样的努力都不会产生预想的结果——完整地认识事物以及对事物进行普遍性的整体描述和透彻分析,只有解构才能还原事物本身。

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是一个需要解构的对象,一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则适时地运用解构的策略对生态现代化进行了基础性的消解^[7]。在这些理论家看来,看似普遍有效的常规标准实际上并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以及普遍的价值,而看似唯一的生态危机也是缥缈的宏大叙述。生态现代化理论所立足的环境改善和变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具有相似特征的问题集合,而是一个多元且复杂的碎片景观。于是,所谓的环境问题在此就成为一个无须解决的问题,而且即便它确实是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被简单地解决了。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此时,生态学家对于现代化发展的批判变得毫无意义,而生态现代化理论也变得不具有任何价值。

然而,正如摩尔和斯帕格林所指出的那样,在对待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上要谨慎对待,必须在不同支系的后现代主义之间以及不同的术语意义之间做出明晰的区分^[8]。因为常常在后现代领域有着深刻影响力的学者并不承认自己的后现代身份,且言辞激烈地反对他者给予他的后现代标签,而同时标榜自己是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他们的观点却并不是后现代的。

必须指明的是,后现代主义对于生态现代化

理论的影响是有限的,它的兴起与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兴起和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欧洲,后现代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走向没落,而生态现代化理论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地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后现代主义对于自己的问题可能更应当去关注,例如,走向了更加虚无、怀疑的世界,迈向了极端的相对主义等,而不是单纯推演其他理论主张的不足。

四、结语

如前所述,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的时代充斥着众多相互区隔而又极具特色的理论和思想激流,恰恰是这些社会理论的广泛探讨和发展给予了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所必需的养分。换句话说,也正是这些理论思想共同形塑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独特个性”,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在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主要表现在生态现代化理论渗透出新自由主义重视市场、经济工具及手段的风格,展现出新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的坚持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自信,也承载了后现代所指出的没有“超越”、简单“修补”的诟病和指责,正是这些社会思想在推动着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通过分析和阐释,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第一,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理论背景是多元而复杂的,以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思潮充斥着生态现代化理论建构的整个过程。这也就意味着,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在宽泛的社会理论视域中寻找自己的生长点,从不同面向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并积极吸纳有益的批评。第二,生态现代化理论建构实际上是一个多理论互动诱发理论变化的过程。生态现代化理论置身于新自由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元理论构成的“理论场”之中,该“理论场”形塑了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形貌。受其影响,生态现代化理论贯彻了新自由主义倡导的资本主义立场,确定用市场的角度审视环境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否认新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才能寻找到社会转型出路的宣告,

同时用非西方国家的生态现代化实践来回应后现代对以往生态现代化理论缺乏区域性差异的质疑等。第三,促使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社会理论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且关注的议题存在不同,有的侧重对资本主义市场价值的探讨,有的侧重对工业化路径的质疑,有的试图在批判工具理性上做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我们在讨论其对生态现代化理论产生和发展的贡献时笔墨分散。但无论如何,深入挖掘其构筑的“思想情境”,对于全面揭示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意涵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 [1] Mol A P J, Sonnenfeld D A.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round the world: perspectives and critical debates[M]. Ilford: Frank Cass, 2000.
- [2] Hajer M 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 discourse: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the police process

-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3] 马尔库塞. 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 任立,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4] 马尔科姆·沃特斯. 现代社会学理论[M]. 杨善华,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0: 200.
- [5] Schnaiberg A. The environment: from surplus to scarcit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6]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 关于知识的报告[M]. 岛子, 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211.
- [7] Blühdorn I. Ecological modernisation and post-ecologist politics[M] // Spaargaren G, Mol A P J, Buttel F. Environment and global modernity. London: Sage, 2000.
- [8] Mol A P J, Spaargaren G.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debate: a review [J].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000, 9(1): 17-49.

Analysis on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MA Guodong

(College of Management, Ningxia Medical University, Yinchuan 750004,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was accompanied with a flood of all schools of thoughts. Theoretical thinking and judgments were made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western modernization in the whole European societies, with an open reflection followed. Although the discussion aroused was not intended to focus on the topic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basis and conditions of theoretical thinking were provided to related theories, especially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This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emergence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indicates that the cognition of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theory should be reverted to the ideological context of its emergence, and deepened based on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neo-liberalism, neo-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Keywords: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environmental crisis; neo-liberalism; neo-Marxism; post-modernism

【责任编辑:章诚】